

基于浙江省军民调研的红色遗址传承与保护体系研究

张洋, 沈雨竹

宁波财经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DOI:10.61369/SE.2026050026

摘 要 : 红色遗址是革命历史及军事记忆的核心物质载体, 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及文化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前, 红色遗址保护利用面临机制缺位、资源不足、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 军民协同治理短板尤为突出。在城乡建设加速、历史见证者减少的背景下, 红色遗址的抢救性保护与系统性活化迫在眉睫。本文围绕红色遗址传承保护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从机制建设、技术支撑、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指出保护责任主体模糊、资金技术投入不均、宣传教育形式化等问题制约遗址功能发挥。据此提出完善军地协同管理机制、构建多元投入与科技赋能体系、推动全民深度参与等策略, 推动红色遗址从静态保存向活态传承转变, 融入当代公共文化生活。

关 键 词 : 浙江省军民调研; 红色遗址; 传承; 保护

Research on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System of Red Sites Based on MilitaryCivilian Investig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Yang, Shen Yuzhu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ingbo, Zhejiang 315000

Abstract : Red historical sites serve as the core material carrier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military memory, holding irreplaceable value for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historical sit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inadequate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low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 prominent shortcomings in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a dwindling number of historical witnesses, emergency conservation and systematic revitalization of red historical sites have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red historical sit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uppor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issues including ambiguous responsible entities for protection, uneven investment in funds and technology, and formalize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restrict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se sites. Accordingly,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such as improving the military-loc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 building a diversified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enabled system, and promoting in-depth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se efforts aim to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d historical sites from static preservation to living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contemporary public cultural life.

Keywords :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search in Zhejiang Province; revolutionary heritage sites; inheritance; preservation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浙江是中国革命重要策源地, 留存大量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紧密相关的红色遗址。伴随城乡建设发展, 部分遗址受自然损毁与人为破坏双重威胁; 虽地方出台相关保护政策, 但缺乏系统规划, 军民融合背景下军队参与路径尚不明确。

浙江诸多红色遗址分布于军事管理区或曾为重要军事据点, 历史价值与军事属性高度交织, 仅靠地方文保体系难以全覆盖。现有研究多从文化、旅游视角切入, 军民协同治理视角缺失, 导致保护实践与历史本真性脱节。因此, 需通过实地调研厘清遗址现状, 明确军地角色与协作机制。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有利于弥补军民融合视野中红色遗址保护的研究不足。已有成果多把红色遗址作为一般文化遗产来看待，而忽略了红色遗址在军事和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浙江诸多红色遗址承载部队驻防、战时动员、地下交通线等军事功能，其保护不能脱离原生功能场景单独开展。依托军民联合调研一手资料，可精准厘清遗址历史脉络与空间联系，避免保护流于形式、过度景观化。本研究构建兼顾历史真实性、军事敏感性与公共教育功能的传承模式，为同类军地交融区域提供参考。该研究既守护红色物质遗存，也完善当代红色记忆传承路径；推动保护工作由单一部门管理转向多方协同，提升历史叙事的深度与说服力。

（三）文献综述

1. 红色遗址保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研究

张缤予（2025）提出，延边州革命遗址保护发展，应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挖多民族共筑革命的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身份认同^[1]。梁振文和陈金元（2025）认为数字化可以突破文化遗产保护的跨界壁垒，但需要构建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协作管理机制，才能破解“信息孤岛”的难题^[2]。刘校汲（2025）指出，厦门“八二三”炮台遗址群的活化需要借助红色旅游与旅游相结合的途径，并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军事遗产叙事之中^[3]。陈凯瑜（2025）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遗址的保护应该打破传统的静态陈列方式，以情景再现的方式进行历史情景的当代转换^[4]。

2. 数字技术与传统工艺融合的遗址保护路径研究

孔强宇（2025）证明 BIM 技术可以精确地记录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建筑结构变形信息，为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提供立体、动态的监控方法^[5]。豆雅瑜和周双爱（2025）提出，林州必须构建“红色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红色基因地图”的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口述史”和“遗址空间”的重建^[6]。刘振（2025）对新四军一师司令部旧址的使用困境进行了剖析，提出了通过微观更新的方式来实现对原有建筑的保护和社区公共空间的要求的均衡^[7]。周全明（2024）从大遗址保护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管理，即在核心区域严禁商业发展，在缓冲区域可以引进体验性商业活动^[8]。

3. 红色遗址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泰宁县（2024）的调查研究表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应与乡村工业规划深度融合，依托旅游收益反哺景区日常管护，构建良性闭环^[9]。沈璐（2024）指出，红色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需吸纳当地居民参与，组建村民合作组织可有效避免保护表层化^[10]。苏姗（2023）通过古山村的案例研究，证明了红色文化遗产的活化能够激活乡村闲置的乡村资源，但是需要提防过度的景观化所带来的“历史语境”剥离^[11]。海敬和张娜（2023）提出，甘肃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借助“红色旅游线路”的优势，把零散的文化遗产融入到当地的旅游经济网络中，以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12]。

一、浙江省军民融合背景下红色遗址调研现状

（一）红色遗址资源分布与类型特征

表1浙江省部分地市红色遗址类型与数量统计

地市	战斗遗址（处）	军事指挥机构旧址（处）	烈士陵园 / 纪念设施（处）	后方医院 / 兵工厂（处）	地下交通站（处）	总计（处）
杭州	17	9	13	6	8	53
宁波	23	14	19	11	12	79
温州	19	11	16	9	15	70
湖州	12	7	10	5	6	40
嘉兴	8	5	9	4	7	33
绍兴	14	8	12	7	9	50

浙江红色遗址呈现明显区域集聚特征，浙西南与浙东沿海分布最为密集。宁波、温州集中了大量战斗遗址和军事指挥机构旧址，凸显了两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省内烈士陵园、纪念设施数量较多，但不少经后期改建，原有遗存保存度偏低。后方医院、兵工厂遗址数量偏少，多隐匿于偏远山村，交通

闭塞导致日常管护难度较大。地下交通站缺乏实物遗存，多仅靠口述史料佐证，遗址认定难度较高。军事属性突出的红色遗址虽与军队史料关联密切，但地方文保登记多忽略其军事背景，保护标准与实际历史价值不相适配。调研还发现，部分已列入文保名录的遗址未纳入军队历史资源协同管理，军地信息互不互通，制约了红色遗址系统性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现有保护与利用政策实施情况

表2浙江省部分红色遗址保护与利用政策实施情况抽样统计

地市	已纳入省级文保名录（处）	有专项保护资金（处）	开展常态化巡查（处）	设有解说 / 展示设施（处）	向公众开放（处）	军地联合管理机制（处）
杭州	31	24	28	36	41	9
宁波	47	38	42	51	58	13
温州	43	32	37	45	52	11
湖州	22	17	19	24	27	5
嘉兴	18	13	15	19	23	4
绍兴	29	21	25	31	35	7

浙江各地红色遗址政策落地存在明显层级差异。省级文保名录虽收录大量重要遗址，但仍有近三成未被认定，小型、偏远的地下交通站及后方医院旧址常被忽视。保护资金多集中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开放、无展陈的遗址缺乏稳定经费保障。杭州、宁波常态化巡查落实较好，湖州、嘉兴部分地区重申报、轻管护，巡查流于形式。展陈建设偏向旅游化，偏重英雄故事叙述，缺少军事背景与战术细节的专业挖掘。多数遗址已对外开放，但利用率不高，不少仅保留外观，内部空间闲置或被挪作他用。军地联合管理尚处试点阶段，军史档案与地方文保数据未互通，同一遗址信息割裂，降低了保护工作的协同性与精准度。

（三）军民协同参与红色遗址保护的实践探索

表3浙江省军民协同参与红色遗址保护实践情况抽样统计

地市	军地联合调研项目数（项）	部队参与修缮遗址数（处）	军史馆与地方展馆合作案例（例）	红色遗址周边军事单位开放日次数（次/年）	民兵/退役军人志愿巡逻队伍（支）
杭州	6	8	4	3	7
宁波	9	12	6	5	11
温州	7	10	5	4	9
湖州	4	5	2	2	5
嘉兴	3	4	2	2	4
绍兴	5	7	3	3	6

军民协同对浙江红色遗址的保护已经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但是总体上还停留在部分试点的层面。宁波、温州依托驻军联合文旅、党史部门开展联合调研，精准摸排战斗遗址、完善史料，并重点修缮指挥所、战地医院等有历史渊源的旧址。军地展馆虽开展史料共享、联合布展，但仅局限于图文陈列，缺乏对军事行动脉络的深度梳理。军营开放日频次少、规模小，群众参与度低，红色教育成效不足。民兵、退役军人志愿队伍参与山区遗址巡护，却缺乏专业培训与制度约束，管护标准不一。当前军民协作多靠单位个人推动，未形成常态化制度平台，军方历史资源未能有效赋能地方保护，协作仍停留在短期活动层面，尚未建立长效机制。

二、红色遗址传承与保护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保护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模糊

遗址管理涉及文物、退役军人事务、党史、文旅、部队等多个部门，无明确牵头单位，军地权责边界不清。地方文保部门对军事相关内容干预有限，部队难以持续投入人力物力，部分遗址形成“两不管”地带。

现有协作多为临时会议或项目制，缺乏制度支撑，保护标准不统一，管理碎片化，难以应对城市更新、自然灾害等风险。

（二）资金与技术支持不足，修缮维护滞后

经费依赖县级财政，文化保护优先级偏低，小型乡村遗址无预算支持；修缮采用普通古建手法，忽视军事设施结构与工艺，

易造成“修旧如新”；数字化保护仅在杭甬个别试点应用，多数地区依赖人工记录，资料难以共享；遗址病害抢险审批流程冗长，错失最佳保护时机；战壕、掩体等特殊遗存无统一勘测加固规范，保护随意性大。

（三）宣传教育薄弱，社会参与度不高

宣传形式单一同质化，重英雄叙事轻历史逻辑；研学流于形式、社区融合不足；新媒体传播固化，难以吸引青年；志愿队伍薄弱，社会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遗址趋于符号化。

三、完善红色遗址传承与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军地协同的红色遗址保护管理机制

省级设立红色遗址军民联合保护协调办公室，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联合部队政工、文物、党史部门制定统一认定、分类、管理标准。对军事背景遗址实行“双登记”，同步纳入地方文保名录与军队历史资源数据库。

在遗址集中区实行军地共管人员制度，由地方文保员与部队史志人员联合开展巡查建档；以协作备忘录厘清权属模糊遗址责任；定期召开军地联合评审会，审核修缮展陈方案，兼顾历史真实与保密需求，实现常态化协同治理。

（二）强化多元投入与科技赋能，提升保护水平

构建“财政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反哺”的多元投入体系，省级设立红色遗产保护基金，支持偏远小型遗址，鼓励企业认养并给予税收优惠。

针对战壕、掩体等特殊遗存研发专属修复工艺，避免套用古建规范；全面推进数字化建档，运用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AI病害识别构建数字孪生模型，实现动态监测；搭建全省技术共享平台，整合高校、科研、军队工程资源提供技术支持；精简修缮审批，为抢险工程开辟绿色通道；完善军事类遗址技术标准，明确基层操作规范。

（三）深化红色文化教育，推动全民参与传承

宣传教育从单向输出转向沉浸互动：中小学开发情境化教学模块，开展角色扮演式研学；社区推进“红色记忆口述计划”，联动老兵、居民整理地方革命史；文旅融合避免过度娱乐化，搭配AR导览、声音剧场增强体验；社交媒体用短视频、播客解读军事细节，吸引青年群体。

建立志愿者认证体系，吸纳学生、退役军人、历史爱好者参与讲解、巡护、资料整理，让公众从旁观者变为共建者，实现红色记忆活态传承。

四、总结

浙江红色遗址承载军事斗争与地方革命交织的历史记忆，保护现状存在制度与实践脱节问题。军地协同机制缺失导致双重属

性遗址陷入治理真空，资金投入依赖行政层级与知名度、技术手段落后加剧遗址老化，宣传教育形式化难以引发大众共鸣。

问题核心在于整合机制缺失，历史价值、军事属性与社会功能未能有效打通。未来需明确省级责任主体、统一专业保护标准、畅通常态化参与渠道，推动红色遗址从静态纪念物转变为活态历史载体。将遗址保护融入军民融合、乡村振兴、公共文化服务全局，使其成为联结历史认知与当代认同的重要媒介。

参考文献

[1] 张缤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延边州革命遗址保护与开发 [J]. 延边党校学报, 2025, 41(05): 84-88.

[2] 梁振文, 陈金元.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遗址协同保护的价值、问题与解决机制 [J]. 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 2025, 4(05): 44-51.

[3] 刘校汲. 基于红色文旅视角下的战争遗址保护传承对策研究——以厦门“八二三”炮战遗址群为例 [J]. 华中建筑, 2025, 43(10): 123-127.

[4] 陈凯瑜. 创新模式下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址为例 [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13): 40-42.

[5] 孔强宇. BIM技术在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为例 [J]. 东方收藏, 2025(04): 155-157.

[6] 豆雅瑜, 周双爱. 新时代林州革命遗址保护与红色基因传承路径研究 [J]. 河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5, 38(02): 28-33.

[7] 刘振. 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与利用——以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遗址研究为例 [J]. 社会与公益, 2025(06): 128-130.

[8] 周全明. 基于大遗址保护视角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28): 111-114.

[9] 泰宁县红色遗址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调查 [J]. 中国老区建设, 2024(08): 51-52.

[10] 沈璐. 乡村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J]. 村委主任, 2024(14): 237-239.

[11] 苏姗. 乡村振兴与文旅资源的耦合机制研究——以吉山村红色文化遗址活化保护与利用为例 [J]. 村委主任, 2023(12): 147-150.

[12] 海敬, 张娜. 以红色旅游为抓手推进甘肃革命文物遗址保护 [J]. 文化产业, 2023(29): 127-129.